

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学家修辞观之比较

刘冠才^{*}

〔摘要〕先秦诸子和古希腊哲学家都讨论到修辞学问题。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肩负的使命不同,二者研究修辞学的目的、理论基础、基本框架均有很大的差别。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修辞学,是在演说学框架下的“言语风格学”,而先秦诸子的修辞学则更接近“美辞学”。从现有的材料看,先秦诸子讨论修辞问题早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但古希腊的学者有一系列修辞学专著,而先秦诸子除了墨家有《小取篇》这样勉强算作修辞学专篇论文外,其他关于修辞的讨论只是散见于诸子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在辞格探讨方面,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学家各有所长;在修辞基本理论阐述方面,先秦诸子要比古希腊哲学家全面深入一些;但在风格学理论方面,古希腊的哲学家又远远超过了先秦诸子。亚里士多德和墨子都是以逻辑控制修辞,在心理分析方面,亚里士多德和韩非子、鬼谷子又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先秦诸子

古希腊是欧洲哲学和文学的摇篮,也是欧洲修辞学的摇篮。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曾经讨论到修辞学的问题,凑巧的是,先秦诸子也讨论过修辞学。由于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肩负的使命不完全相同,他们研究修辞学的目的、理论基础、基本框架均有很大的差别。下面,我们就从修辞学兴起的原因、研究重点、基本原则、辞格理论及风格学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学家在修辞学方面的异同之处。

一、不同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二者修辞学兴起的原因不同

古希腊早期的民主制决定了古希腊的修辞学是在演说学框架下的修辞学。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以城邦为中心的城邦民主制,其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全体公民以统治者的身份参与政治,集体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表现为法律至上,权力互相制约,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这种民主政治,使得古希腊的每个公民都具有阐明自己政治主张和进行诉讼辩论的权利和机会。在民主政体下,如富豪子弟想要在政治上谋求出路,往往需要进行“政治演说”才能达到目的。另有一些被独裁政府放逐的贵族,在独裁政府倒台后,他们回到城邦,力图追回个人的土地和财产,需要进行“诉讼演说”;还有工商

^{*}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10097。

业界的钱财纠纷者,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也需要进行“诉讼演说”。还有一些人,如那些在典礼场合需要对某人某事进行称赞或谴责者,会涉及“典礼演说”。无论是进行“政治演说”、“诉讼演说”,还是进行“典礼演说”,都需要进行修辞活动。因此,围绕着研究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典礼演说技巧的修辞术也就在古希腊应运而生了。民主制度,为古希腊修辞学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土壤;自由演说,成为修辞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公元前5世纪,雅典诞生了一群教师,也就是诡辩家,他们培养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典礼演说等方面的人才。所有诡辩家都将重点放在了教授修辞学上,并且还有人写出了修辞学教材^①。后来又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哲学家们从事修辞学研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还写出了《修辞学》这样千古不朽的名著。

我国先秦时期虽然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实行民主政治,但比起秦以后的封建专制集权来,社会环境也是比较宽松的。西周的分封制,虽然表面上维持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但各个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东周春秋以后,周天子渐渐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各个诸侯国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开始进行混战。从郑庄公开始的“小霸”,到春秋末期的吴越争雄,整个春秋的242年间(前722—前481),神州大地发生了几百起战事。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兼并、统一步伐的加快,战争的频率和规模也在急剧上升。这种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百舸争流的社会局面,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为先秦时期的修辞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为了生存和发展,对内需要变革图强,对外需要缔交结盟。这样,肩负冲锋搏杀、修好结援任务的行人(外交官),在列国朝聘往来的外交场合,要想出色地完成各种使命,必须善于辞令,诸如吕相绝秦、子产献捷、王孙满止楚问鼎、屈完面折管仲、烛之武智退秦师等等,都是因舌辩过人而取得显著的效果。当时的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这就促进了修辞的发展。第二,各诸侯国的吸引人才、争相养“士”的风气,促成了游说之士蜂出的局面。作为知识阶层的“士”,为了游说诸侯,推销自己,他们“朝秦暮楚”,择主而事,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无论是苏秦兜售合纵之说挟上六国相印,还是商鞅以游说成功而登上秦国变法总设计师的宝座,都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遂愿的。第三,一些思想家广收门徒,著书立说,对与自己思想相抵触的“异端”进行攻击、鞭挞,形成了长达数百年的诸子争鸣的局面。无论是儒家宣扬王道、仁政,道家遵守无为、达生,法家鼓吹严刑酷法,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名家坚持“白马非马”,农家倡导君民并耕,还是兵家追求克敌制胜,纵横家讲究捭阖纵横,不论是进行口头舌战,还是从事书面笔攻,都需要言精语工。诸子争鸣,留下了许多栩栩如生唇枪舌剑的画面,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千古不朽的杰作——诸子散文。第四,统治者为了掌握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吸取前朝历代失败的教训,记载兴亡成败历史的典籍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散文^②。总之,“行人”的外交实践、“游士”的游说活动,促使口语修辞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历史散文发展,促进书面修辞的进一步成熟,百家争鸣,促进了口语修辞和书面语修辞的同时发展提高。以诸子著作、历史著作作为代表的散文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诗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主体,其中有着大量的修辞技巧。诸如“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衬托、排比、层递、设问、反问、顶针、回环、摹状、拟声、双关、反语、叠字、叠句、双声、叠韵”等等修辞格常常在《诗经》、楚辞中交错使用,前后配合,互补互衬^③。在孔门弟子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中,“比喻、反复、层递、设问、排比、引用”等十几种修辞格是常常使用的。又如《孟子》一书运用比喻方法论述问题的就有六七十次之多。^④中国先民追求的是“立德”、“立言”、“立行”三不朽,这种潜在意识也对修辞技巧的

①如克拉克斯及其弟子提西阿斯首先编写修辞课本,在雅典传授诉讼知识,教人民以似是而非的论证取胜。

②早期的历史散文《尚书》属于政治文献方面的资料汇编,与后代的历史散文并不完全相同。

③参见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年,第6页。

④参看郑子瑜:《论先秦诸子的修辞技巧》,《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修辞技巧的长足的发展,自然会产生总结修辞技巧的理论。当然,修辞理论的产生,又会进一步促进修辞技巧的发展。先秦诸子在充分运用修辞技巧的同时,自然会对修辞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总之,社会变革、诸侯混战、百家争鸣,是中国修辞学产生、发展的沃土;民主政治,争取人权,是古希腊修辞术蓬勃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二、不同的历史使命奠定了二者不同的修辞学风貌

不论是智者派把修辞看成是“说服的技巧”^①,还是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第1卷第2章第1段,24,1355b)^②,古希腊修辞学的目的都是要把听者“说服”。说服对方的关键一则要对听者有所了解,一则自己的话要让对方听起来是言之成理、合乎逻辑。这样,古希腊修辞学研究的重点就放在“就什么样的问题”、“运用什么样的手段”、“说服什么样的听众”这三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就是按着这些重点来构建其修辞学体系的。

关于“就什么样的问题”和“说服什么样的听众”,《修辞学》根据听众的种类将演说分为“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三种。“政治演说”的听众是“公民”,“诉讼演说”的听众是“陪审员”,“典礼演说”的听众为一般人或读者(第1卷第1章,30—31页,1358b—1359a)。围绕着政治演说,《修辞学》讨论了各种政体问题,包括民主政体、寡头政体、贤人政体、独头政体、君主制、独裁制以及各种政体的目的、各种政体的特点(第1卷第8章,42—43,1366a)。围绕着诉讼演说,《修辞学》讨论了与之有关的控告与答辩、害人的定义、害人的原因、行为的动因、害人者的心情、害人者的种类、法律、特别法、普通法、不成文法、公平法、无意的行动、有意的行动、不幸的事件、错误、罪行、罪行的大小。围绕着典礼演说,《修辞学》讨论了幸福的定义、幸福的成分(第五章);好事的定义、好事、好东西、成问题的东西(第六章)、更好更有用的东西、好东西的定义(第七章);称赞与谴责的对象、高尚的事的定义、各种美德、各种高尚的事(第九章);快感的定义、愉快的事物、滑稽的事物(第十一章)。

“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说服听众”,就是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定义中的“可能的说服方式”。根据我们的理解,应该包括“运用什么样的推论手段”、运用“什么样的表述技巧”和“如何组织已有的材料”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运用什么样的推论手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修辞式推论”。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多次使用“或然式的证明”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把“或然式的证明”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一类是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不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指不是由我们提供的,而是现成的或然式证明”,^③包括“法律、见证、拷问、契约、誓言”五类。^④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是指“所有能由法则和我们的能力提供的或然式证明”。这是需要演讲者凭借修辞方法达成的说服论证。《修辞学》重点研究的就是“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修辞学》第一卷第2章和第二卷18至26章就如何取得说服的成功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他把“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法则提供的,一种是由演说者提供的。亚里士多德把由演说者提供的“或然式的证明”又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演说者的性格即道德品质、人格威信造成的;第二种是由使听者处于某种心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而造成的;第三种是由

①说服的技巧,又被译成“哄骗的技巧”。所谓“技巧”,实际上就是一种“诈术”。

②本文所引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均依据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24页。

④《修辞学》卷一第十五章专门讨论“不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第62页)。

演说本身有所证明或似乎有所证明而造成的。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种基本说服方式。在这三种方式里,第一和第二两种方式与现代修辞学的关系较远,但却是《修辞学》重点讨论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演说者要说服听众,就得对各类听众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征有所了解,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各类听众的不同心理特征。《修辞学》第二卷26章,其中第1章至第17章就是重点讨论与演讲者的性格和听众心理特征有关的问题的。第三种方式与修辞学关系较近,当然这种方式与逻辑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也可以称为“逻辑论证”。这也是《修辞学》重点讨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将这种方式分成“修辞式三段论”、“例证法”和“准则”三类^①。“例证法”是一种归纳推理法;“准则”就是“格言”,它是所有人都接受的普遍法则,一般为修辞三段论的前提。修辞式推论的题材有四种:或然的事、例子、确实的证据、或然的证据。《修辞学》最早提出了“部目”这个概念。“部目”指的是“论据的类型”,它是修辞式论证所依据的题材。在修辞式推论中,论辩者为了获得论据的支持和维护自己的观点则必须借助“部目”来进行。《修辞学》第一卷第二章把部目分为“通用部目”和“专用部目”两大类。通用部目的事例通用于法律、自然科学、政治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专用部目是由每一种类的事理所特有的命题组成,仅适用于某一特定的修辞场合或演讲类型。《修辞学》第二卷23章共列举了修辞式推论所必须取材的28种部目,这些部目是论辩所依赖的论据和策略并适用于各种话语论辩场合,它能够帮助人们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修辞学》还举出在修辞式推论中不能使用的9个谬误的部目即假冒的修辞式推论的部目^②。《修辞学》卷二第25章还讨论了驳论的手法。关于运用什么样的技巧,应该包括运用“什么样的辞格”和运用“什么样的风格”。运用“什么样的风格”是《修辞学》第三卷的主要内容,运用“什么样的辞格”在《修辞学》卷一、卷二都多少涉及一些,主要也在卷三。关于“如何组织材料”(谋篇布局),也主要见于《修辞学》第三卷(见下文)。由此可见,《修辞学》三卷,第一卷和第二卷虽然也讨论到一些修辞问题,但主要是围绕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来讨论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和逻辑学方面的问题。只有第三卷重点讨论的风格和安排的问题,与修辞学的关系比较密切。也就是说,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修辞学,是在演讲术、逻辑学的框架下来展开的。古希腊修辞学重在研究说服的艺术,实际上应该称为“演讲术”,更接近现在我们所说的“演讲写作学”。心理分析和逻辑论证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研究的重点。亚里士多德说:“修辞术实际上是论辩术的分支,也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由于这个缘故,修辞术貌似政治学。”(第1卷第2章,25,1356b)

先秦诸子的修辞学,尤其是儒家的修辞学,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修辞立其诚”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下展开的。古人把“立言”看成是不朽的盛事,这里的“立言”主要是指在思想上能使人积极向上的思想的表述。“修辞立其诚”是《周易·乾·文言》里面的话,原文是: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是《文言》里面所说孔子为解释乾卦的九三爻辞所说的。大意是:君子通过整顿文教以确定其诚实的态度,可以以此来保其功业。按孔颖达疏,辞,意为文教,也就是礼乐法度、文章教化之类。居业,就是保有功业的意思。后来,“修辞立其诚”的意思发生了变化,意指修饰文辞,表达真情。至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言以足文;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人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在这些思想的统帅下,先秦诸子的修辞学讨论的重点则放在修辞的重

①《修辞学》卷二20章至25章对此进行了讨论。

②“措辞部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不经过三段论式推论步骤而终于得出的三段论式结论组成的,一类是由相同的名称组成的)、“分合部目”(就是把合在一起的事物分开来说,把分开的事物合在一起来说)、“愤慨部目”(就是用愤慨的言辞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者驳斥对方的论点)、“或然的证据部目”(一种不合乎逻辑的论证)、“偶然事件部目”(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后果部目”(和某些人一样)、“非因作因部目”(一件事与他事同时发生,或随他事而发生,误认为先发生的事是因)、“省略部目”(对时间与条件避而不谈)、“绝对与特殊混用的部目”(把不是绝对的可能说成是绝对的可能,特殊的可能不具有普遍性)。

要性、修辞应遵循的原则(慎言)、辞格的运用等方面。只有墨子讲究推论,韩非子、鬼谷子讲究揣摩听者心理,与亚里士多德的心理特征的描写,修辞式推论的阐述有相通之处。先秦诸子关于修辞学的讨论,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关修辞的重要性、言辞、文辞与思想内容的关系、修辞应该遵循的原则、修辞与客观环境、辞格、修辞鉴赏等问题^①。

三、对修辞基本问题的认识先秦诸子比古希腊哲学家深入细致

先秦时期虽然是汉语修辞学的萌芽时期,但一些重要的修辞理论此时已初露端倪,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对修辞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先秦诸子中,孔子较早地对语言的重要性和语言规范的必要性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已经认识到语言在表达思想、了解社会、认识事物方面的重要作用,甚至把语言规范看成是治国行政的首要任务^②。同时孔子还清醒地认识到,修辞对外交的成败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很赞赏当时郑国的重视外交辞令^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称赞郑国外交成功的话:“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此外,孔子还认为修辞在人们日常交际和修身立命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④。先秦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也对修辞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荀子·非相》篇中还说:“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指出言辞表达在交际往来中是至关重要的。墨子对修辞的重要性也有过明确的论述。《墨子·非命下》:“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墨子指出,言辞运用得好,不仅是为了个人语言流利、文字漂亮,而是要使文辞、言语更好地为国家、社会、人民、政治服务,这是墨子修辞学的根本出发点。亚里士多德对修辞的重要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修辞术是有用的,可以使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如果判决不当,那是由于不懂修辞术之故。艺术的功能就在于找出成败的原因。”^⑤可见,古希腊哲学家对修辞重要性的认识只是局限在演讲学的范围内。2.先秦诸子对言辞、文辞与思想内容的关系,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文质并重”的修辞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他主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周易·乾·文言》说他主张“修辞立其诚”。^⑥这是我国把“修”和“辞”两字连在一起的最早记载,更为可贵的是这里又把“修辞”与个人修身立命联系起来^⑦。与儒家的“文质并重”的修辞观不完全相同,墨家提出了“先质后文”的修辞观。墨家重视言辞的论辩作用,重视辩论方法的严密,不追求言辞文彩。墨者认为人们在表情达意的时候,如果过分追求辞藻华丽,听者就会沉于欣赏辞藻而忽略言者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怀其文而忘其直”,就会出现贵妾贱妻、买椟还珠的现象^⑧。当然,墨家虽然尚质,但也并不否定有文采,只不过主张“先质而后文”而已。道家创始人老子从他的顺应天道自然的哲学观点出发,主张“重质轻文”。他说:“希言自然”(23章)、“多言数穷”(5章)、“大辩若讷”(45章)、“善者不辩,辩者不善”(81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81章)。道家的庄子也是主张顺乎自然,反对雕琢、“重质轻文”的。庄子及其后学,反对一切浮华不实之词,并进一步反对言辞辩说,他认为所有的言辞辩说都是徒劳无益的。

①参见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5—71页。

②见《论语·子路》“卫君待子而为政章”(13.3)。

③见《论语·宪问》“为命:裨谌草创之章”(14.8)。

④参看刘冠才:《从〈论语〉看孔子的慎言思想及其哲学意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1期。

⑤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导言)第7页、(第一卷第1章末段)第22页及注4。

⑥“修辞立其诚”虽然不一定出自孔子,但出自儒家经典确是无疑的。

⑦后人对“修辞立其诚”有多种解释,说明语言美化与表达真诚态度的相应关系。“修辞立其诚”本是从政治的要求出发,作为君子“居业”的条件提出的。后来被引申为作文、修辞的总原则。

⑧“买椟还珠”这一成语就是出于墨者之口,见《韩非子·外储说》。

法家韩非子比墨子的观点更极端了一步,提出“重质反文”即重视本质的美,反对一切文饰的观点。奇怪的是,老子、庄子主张“重质轻文”,但是他们的散文都文辞优美;韩非子极力“尚质反文”,但他写的文章都很严密,并且大量运用修辞手段。

3. 先秦诸子对修辞应该遵循的原则的论述。关于修辞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先秦诸子中,以孔子的观点最为科学通达。《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他要求言辞、文辞必须明白、晓畅、达意。“辞达”说对后世影响深远,一直被奉为作文、修辞的准绳之一。孔子在《论语·雍也》又提出了“文质彬彬”的修辞原则。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所说的“质”指的是语言要明白、朴素,要信实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文”指的是语言表达要生动、华美、有文采;“野”指的是粗野、鄙俗;“史”指的是“虚华无实”、“多饰少实”之意。只有既有“文”,又有“质”,做到“文质彬彬”,在言辞、文辞上达到文质兼美的境界,才能成为“君子”。这是孔子的修辞观,这一修辞观在孔门弟子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孔子的“辞达而已矣”、“文质彬彬”等观点,成为历代修辞原则的源头。

4. 先秦诸子对修辞与客观环境关系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主张演说者要分析听众的心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演说技巧,用现代修辞学理论进行概括的话就是写说要注意适应“题旨与情境”。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儒家、墨家和法家的著作中,也有很多关于写说要选择时机、注意场合、考虑听众对象的论述。孔子多次谈到说话要选择时机、要“注意场合”、注意不同的说话对象^②。荀子对孔子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发。《荀子·劝学》:“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说的是“君子”与来请教的人谈“道”,谈得深度如何,要看对方是否“礼恭”、“辞顺”、“色从”,不能急躁,不能隐私,也不能盲目。墨子也提出了“言之时”的观点。《墨子佚文》说:“子禽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辍然而不听(一作‘口干而人不听之’),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无益,唯其言之时也。’”^③墨子认为,言辞、文辞的多和少必须根据当时的需要而定。墨子也主张写说注意场合、要考虑听众对象。他在《鲁问》中主张“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针对不同的情况,确定要谈说的内容。在《鲁问》中他还谈到对待“民众”的态度:如民众对“义”还不了解时,要“义耳义耳”不厌其烦地进行解说。对于“君亲”,墨子在《非儒下》中认为,在讲话时不应当有保留,应该主动积极,不应该像钟一样,扣之则鸣,不扣则不鸣,也不能像算盘珠一样,拨一拨动一动。墨子关于与“君亲”、“民众”说话的态度,就体现了写说要“考虑对象”的主张。《墨子·经下》还主张“通意后对”,即在辞令答对时,一定要先理解清楚对方的语意。当然在论述写说要注意对方的神态,研究对方的心理,理解对方的语意这方面以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最具有代表性。韩非子在《说难》中根据战国时谋臣的游说教训和自身进谏韩王的体会,总结了游说君主的经验,指出向君主进行游说时必须了解君主的心理变化,并要随时适应这种变化,否则就达不到好的效果。他列举出君主的各种不同心态,并提出与之适应的各种不同的游说方法,总的原则是要“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即夸大被游说对象自以为得意之处,掩饰其自认为可耻之处。这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主张演说者要分析听众心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有些地方的分析还要比《修辞学》深入。总之,修辞必须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为人们所重视。

5. 先秦诸子也注意到在交际实践中听读者应如何正确理解对方运用语言艺术的问题。孟子自诩为“知言”,怎样才能“知言”呢?《孟子·公孙丑上》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原则。“以意逆志”,就是说在分析诗歌

①据《论语·颜渊》记载,卫国的大夫棘子成反对孔子的“文质彬彬”说,他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反驳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棘子成认为君子只要有“质”就行了,要“文”是多余的。子贡认为“文”和“质”同样重要,并以“虎豹”和“犬羊”的皮为喻,说明二者正是凭借“炳蔚的文”进行区别的。

②参看刘冠才:《从〈论语〉看孔子的慎言思想及其哲学意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1期。

③见孙诒让:《墨子闲诂·附录·墨子佚文》。

时不能拘泥于个别字眼而曲解其辞句,不能局限于辞句的表面意义而歪曲了作品的原意,即“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应该从整个诗篇的意义来探索作者的意旨。“知人论世”,就是说要正确地理解作品,必须对作者的生活、思想,对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都要有所了解,这是“以意逆志”原则的基础。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原则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以上几点,先秦诸子均比古希腊哲学家的见解深入细致。

四、对辞格的认识先秦诸子比古希腊哲学家全面系统

《修辞学》讨论的辞格主要是“比喻”。《修辞学》第二卷第20章作为例子的一种提到了“比喻”这个概念,在第三卷对“比喻”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修辞学》把比喻分为明喻和隐喻,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举例说明。亚里士多德说:“明喻也是隐喻^①,二者的差别是很小的。”(卷三第4章,158,1407a)“明喻去掉了说明,就成了隐喻。”(卷三第4章,160,1407b)在明喻和隐喻之中,亚里士多德更主张多用隐喻而少用明喻。他说:“明喻在散文里也有用处,但是应当少用一些,因为它们带有诗意。”(卷三第4章,159)亚里士多德将隐喻分为四类^②,认为“类比式的隐喻最受欢迎”(卷三第10章,177),因为“巧妙的话来自类比式隐喻和使事物活现的说法”(卷三第11章,181)。亚里士多德对“隐喻字”的作用及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也作了说明。此外,《修辞学》卷一第9章讨论的“夸张法”与现代修辞学的“夸张”辞格不是一回事,《修辞学》卷二第26章讨论的夸大、缩小,与现代修辞学的“扩大夸张”、“缩小夸张”也没有什么关系;《修辞学》卷一第9章讨论的“比较法”与现代修辞学的“对比”辞格也不是同一的东西。另外,《修辞学》卷一第2章讲到的“例证法”、“例子”,与现代修辞学的“引用”辞格关系也不大^③。可见,亚里士多德最为看重,论述得最多最深入的要数比喻。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与辞格有一定关系的“谚语”、“格言”和“寓言”。

在辞格理论方面,先秦诸子优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的有三点:第一,先秦诸子讨论的辞格多于亚里士多德讨论的修辞格。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重点讨论的辞格主要是“比喻”,而先秦诸子讨论的辞格,除了比喻外,还有“夸张”、“引用”、“对比”、“对偶”、“委婉”、“含蓄”、“反言”等。第二,为一些辞格下了明确的定义。如亚里士多德和先秦诸子都讨论过比喻,翻遍《修辞学》,我们只能了解到比喻的分类、作用,很难找到“比喻”的准确定义。先秦诸子不仅讨论到了比喻的用途,同时也给比喻下了明确的定义。在这方面做得出色的是墨家,在《墨子·小取》中,对“比喻”、“引用”、“对偶”、“对比”等都下了比较清晰的定义。《小取》:“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④这是墨家给比喻下的定义,“比喻”就是用他事物来说明此事物的方法。后来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又说“比喻”是“以其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⑤惠施认为比喻的目的是使对方明白懂得,是对墨子学说的补充。又如《小取》:“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是“援引”,这里所说的“援”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引用”辞格相近。当然,在先秦诸子中,对引用辞格讨论比较深入的是庄子。庄子称“引用”辞格

①在《修辞学》中三次说到“明喻也是隐喻”,除此外还有第176页(卷三第十章),第187页(卷三第十一章)。

②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二十一章中将“隐喻”分为借“属”作“种”、借“种”作“属”、借“种”作“种”、借“类”比字。

③例证法中的一些例子似乎和“稽古”辞格相类。关于“稽古”,参看王力:《古代汉语》(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70—1371页。

④先秦诸子中,较早谈到“比喻”的是孔子,他在《论语·雍也》中论及“仁”时只是说“能近取譬”。比喻,古人称之为“譬”,又写作“辟”。

⑤见汉刘向《说苑·善说》记载的梁惠王与惠施关于比喻的对话。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若何?’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为“重言”。在《寓言》篇中说：“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成玄英疏云：“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可见，所谓“重言”，就是引用权威、长者的成说来证实自己观点的修辞方式，它相当于现代修辞学上的“引用”辞格。又如《墨子·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孙诒让《墨子闲诂》：“《说文》侔，齐等也，谓辞义齐等，比而同之。”侔，相同的句子，相同的命题；比辞而俱行，相同的命题可以一起实行，由此推彼，谓辞义相等，比而同之。墨子的这一论述，是讨论对比、对照、对偶手法的源头。另外，《小取》：“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这里“效”就是在论理的时候立一个参照物，作为评判的标准，其作用与引用、对比、对照相近。儒家的孟子也讨论到了辞格问题。《尽心下》：“孟子曰：‘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中的“言近而旨远”之说，实为后世委婉、含蓄、暗示等修辞手法的先声。又如《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这里孟子要求对诗中的夸张辞不要拘泥于辞句的表面涵义而歪曲作品原意，而要根据诗篇的整体去探索作者的意图。孟子虽然没有讲到夸张一词，但他已触及了夸张手法。此外，道家创始人老子还提出了“正言若反”的“反言格”。《老子》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故弱胜强，柔胜刚，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故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宋代苏辙释此为“正言合道而反俗”，即指合于自然规律、客观事理却与世俗见解相反的话。现代修辞学中，称为“相反相成”手法的，即相当于“正言若反”。“正言若反”是用对立矛盾的语词来表达相反相成的内容，这一手法在《老子》一书中“触处弥望”^①。

五、对语言风格学的理解古希腊哲学家远远高于先秦诸子

汉语文体、语体风格论萌芽很早，在《尚书》中就有“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论述。《周礼·春官·大祝》最早试着对部分文章体裁进行分类，提出“六辞说”。^②《周礼·春官·大师》把诗体分为风、雅、颂三类，可以看成最早对诗体进行分类^③。不过，这些与先秦诸子的关系均不太大。先秦诸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气象万千，其中《庄子》的恣意汪洋、想象丰富，《孟子》的气势磅礴、咄咄逼人，《荀子》的立论谨严、说理透彻，《韩非子》尖刻犀利、分析入微，无不风格鲜明。先秦诸子在争鸣中为了取得学说上的胜利和宣传效果，自然十分注重各种论辩、修辞的方法，因而当时比喻、讽喻、排比、委婉、正言若反等手法特别受到重视。但处于修辞学萌芽时期的春秋战国时期，对作家的语言风格的论述还没有充分展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所说的“巧言乱德”中的“言”，以及《周易·系辞下》提到的“修辞立其诚”和《孟子·公孙丑上》所讲的“知言”都是笼统地讨论“言”和“辞”，先秦诸子本身对语言风格的讨论却是非常少见的。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修辞学则不然，把语言风格研究作为修辞学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讨论了诗的风格^④，在《修辞学》中重点讨论散文的风格，因为散文风格与演讲密切相关。《修辞学》第三卷重点讨论的就是“风格”和与风格有关的“安排”的问题。关于散文的风格，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具备如下几点：1. 明晰，就是明白清晰，是词语的选择和修辞手法运用的

^①关于“正言若反”，参看唐钺《修辞格》一书中的“反言格”，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一书中将此种法式归入“警策”、映衬——反映，钱钟书《管锥篇》卷二：“正言若反”。

^②《周礼·春官·大祝》把“祠、命、诰、会、祷、誨”称作“六辞”。

^③《周礼·春官·大师》把“风、雅、颂、赋、比、兴”称作“六诗”。把诗体分为风雅颂三类，可以看成最早将诗体进行分类（尽管早已有人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但那是内容的分类，不是诗体的分类）。

^④《诗学》21—26章是讨论诗的风格。

问题。亚里士多德指出：“风格的美可以确定为明晰。”他说：“一篇演说如果意思不清楚，就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如何才能做到“明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熟悉又容易理解的常用字和隐喻是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说：“在名词和动词中只有普通字才能使风格显得明晰。”^①（第3卷第2章第1段，1404b）他又说：“隐喻字最能使风格显得明晰，使人喜爱，并且使风格带上异乡情调。”（第3卷第2章第3段，152，1405a）也就是说使用普通常见的字和词，恰当使用隐喻修辞手法可以达到散文清晰的效果。

2. 紧凑，指句子结构的紧凑，是句式选择方面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散文的句子，应当采用紧凑的“环形句”而不应当采用松散的“串连句”。所谓“环形句”，指意思完全，有头有尾，容易掌握的句子，其中有对比，有反衬，这种句子讨人喜欢，方便记忆，容易理解。所谓“串连句”，指没完没了，要等到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才告结束的句子，这是旧体，由于没有限制而不讨人喜欢。（第3卷第9章第1段，170）采用“环形句”的原则，是伊索格拉底首先提出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对“环形句”有深入的分析，并且指出它的许多优点。

3. 节奏，是指有规律或无规律的阶段性的变化，体现在语言运用上就是“节拍”。亚里士多德说：“散文的形式不应当有韵律，也不应当没有节奏。演说有了韵律^②，就没有说服力（因为那会被认为是做作的结果），……同时，还会分散听者的注意力。使他期待同样的韵律何时重复，……可是没有节奏，又太没有限制，限制应当有，……因为没有限制的话是不讨人喜欢的，不好懂的。”“因此，辞章或散文须有节奏，但不应有韵律，否则就会成为韵文了。这种节奏不应当太严格，只求有一定的严格性就行了。”（第3卷第8章第1段，167—168，1408b）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只有派安格节奏最适合采用^③，因为只有“派安格”的节奏才不构成规则的韵律，其他节奏由于太韵律化了而容易为听众所觉察。这个原则是伊索格拉底首先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对散文的节奏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4. 自然，就是反对矫揉造作。他说：“话要说得自然才有说服力，矫揉造作适得其反，因为人们疑心说话的人在捣鬼，就像疑心酒里掺了水一样。”（第3卷第2章第3段，151，1404b）

5. “生动”，就是活灵活现，不呆板。亚里士多德说：“措辞要是能使事物呈现在眼前，也能受欢迎。”（第3卷第10章第2段，177）亚里士多德指出，风格的呆板是由四种原因造成的：第一种是滥用双音复合词；第二种（另一种）是滥用奇字；第三是使用过长的或不合时宜的或过多的附加词；第四是滥用隐喻字。（第三卷第三章，156—158，1406a—1406b）

6. 适合，就是得体，这是散文风格必须达到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主张散文的风格“既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拔得太高，而应求其适合。”（第三卷第二章，150，1404b）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适合”包括：（1）根据不同的题材确定言说的基调。他说：“风格如果能表达情感而又和题材相适应，就是适合的。求其适合，就是不把重大的题材随便说说，不把普通的事情看得很严肃。”（第3卷第7章第1段，164）（2）繁简要恰到好处。他指出：“风格太繁缛，就不明晰；太简练，也不明晰。显然，只有不繁不简的风格才是适合的。”（第3卷第12章第3段，191）（3）各种手法的使用要恰当地得体。亚里士多德一方面主张尽量多用隐喻，但同时也反对滥用隐喻。他说：“使用隐喻字和使用附加词一样，必须求其适合。”（第3卷第2章第3段，152）（4）不同的演说应具有不同的风格。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风格适合于不同的演说。笔写的文章的风格不同于论战的演说的风格（政治演说的风格也不同于诉讼演说的风格）。”（第3卷第12章第1段，188）“政治演说的风格完全像是一幅浓淡色调的风景画，群众越多，景色越远；这种风格和图画里，过于精确是浪费笔墨，反而更糟。诉讼演说的风格比较精确；面对单个审判者发表的演说，风格更精确。”（第3卷第12章第1段，191，1414a）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150页。

② 韵律，罗念生译本作“格律”。

③ 派安格节奏由一个长音节和三个短音节组成，长短音节可以随意置于句句首末，这样就避免了形成格律。这个原则是伊索格拉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散文的节奏有深入的分析。“派安格”的音步由一个长音级和三个短音级组成，长音级一般放在音步的首位，也可以放在其他的位置上，这样才不至于形成格律。

《修辞学》第三卷最后部分是讨论文章的安排。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篇演说分两部分，必须对事情有所说明，然后加以证明。”即“提出问题”和“证明问题”。所以说一篇演说最多只能由序论、提出、证明和结束语四部分构成。序论是演说的开场白，其最迫切的任务在于明确指出演讲的目的是什么。至于结束语，一般有四种作用：“或者使听者对自己发生好感而对对方抱有恶感，或者夸大或缩小，或者激起听者的激情，或者唤起听者的记忆”（亚里士多德 1991：1419b）。这些论述显然不是《易·艮卦》简单的“言有序”四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对修辞学的探讨是很早的，但就留存下来的资料看，与先秦诸子的修辞学相比，在时间上稍晚一些。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前 580—前 500）、孔子（前 551—前 479），尤其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修辞理论，他的一些有关修辞的学说迄今仍有一定的意义。与孔子时代相仿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 540—前 480）并没像样的修辞理论流传下来。古希腊的恩培多克斯（前 490—前 430）创立了修辞学，但是恩氏没有修辞理论和著作流传下来^①。老子、孔子都早于恩培多克斯几十年，他们均有关于修辞的理论流传下来。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创立了科学的修辞学，奠定了欧洲修辞学的基础。《修辞学》是欧洲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修辞学著作，亚里士多德也是将修辞学理论进行系统化的历史第一人，他不但总结了古希腊修辞学的精华，也奠定了后世西方修辞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当代修辞学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体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杨嵘均）

A Comparison of Views on Rhetoric between Pre-Qin Chinese Thinkers and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LIU Guan-cai

Abstract: Pre-Qin Chinese thinkers and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both explored the topic of rhetoric.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urpose, their thoughts on rhetoric differed in the objectiv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basic framework. The ancient Greek rhetoric studies with Aristotle as its representative were concerned with stylistics carried out in the framework of oration, whereas those of the Pre-Qin thinkers were more of aesthetic rhetoric. Seen from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thinkers in the Pre-Qin period were earlier than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to discuss rhetoric. But different from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who wrote a series of monographs on rhetoric, the Pre-Qin scholars seldom produced any monographs or treatises on rhetoric: with Mozi's *Xiaoqu pian* 小取篇 (literally *Minor Illustrations*) as an exception which can marginally be accepted as a treatise on rhetoric, their discussions of rhetoric were dispersed in different works. A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figures of speech, the Pre-Qin thinkers and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had their own advantages: the former were stronger in theorization on figures of speech, while the latter were better at theorization on stylistic devices. Aristotle and Mozi both put rhetoric under the control of logic; but Aristotle showed his own uniqueness in psychological analysis in comparison with Han Feizi and Gui Guzi.

Key words: *Rhetoric*; Aristotle; Pre-Qin thinkers

^①Empedokles，一译恩培多克勒，实际上应该译作恩培多克勒斯，留下来的是《论自然》残篇。